

都市空間轉變及其價值之探討

林君潔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地方因人們生活的鏈結而塑造出不同的空間意義，這樣的實踐過程隨著時間、環境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形式的互動關係和人們共存。城市的樣貌有著今昔之間的差異，為了延續過去，攀住現在如同對過去的一種情感寄託，這種強烈地方情感建設中，表面看似現代卻仍充滿對過去的幻覺，實質上內部構造和氛圍早已失去原有的樣貌。

城市的樣貌隨著時間而轉換，但人們對環境美好的記憶卻保留在每個人的心中，雖然今昔之間已不是同一個場景，但對環境的記憶卻永遠存在；透過環境追尋自我的歸屬，這種文化鄉愁寄託了我們各種情感，無論是認同或是疏離，這些強烈的地方情感，與文化保留及創新循環不息的對應關係，擁有著不容否認的歸屬感，並具有無法推翻的鄉土價值。

本文就眷村改建、南機場國宅、臺北圓環及紀州庵文學森林的今昔關係等四部分，探討都市特殊文化保存與整宅政策、商家聚落與時代記憶轉變下都市空間的轉換關係。

關鍵詞：城市、地方、空間、烏托邦

前言

過去數十年間，在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促進了人民富裕繁榮的社會，環境的再造、工業迅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洪流下，那些兒時美好記憶、自然的遊戲場域，傳統典型的眷村住宅，突然間消逝汰去，雨後春筍般的都市建設，成為新的環境指標，這些新的建設中涵括了人們的生活需求、產業模式的經營、文化的延續，以及政治意識的介入，河道形成了馬路，公寓換成高樓，空地變為工業區，城市中刻畫累積著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也反映了人們的需求與想像，整體看似一種經濟指標提升、繁榮進步前衛的象徵，但實際這些演變是真的符合人們期盼的希望空間？亦或是為了滿足短暫的需求？在面對資本主義高度移動的狀況下，居住的地方是否因建設而改變了原有人與人之間的特殊情誼和交流？事實上，人們居住空間並非一成不變，它隨著生活需求、消費行為而變動，它是一個充滿流動性的鏈結關係，關聯著人們之間的所有事物，這種緊密性的互動關係，型態上隨著時間而改變，當中的演進變化，需要進一步探究瞭解。本文試圖以臺北城市建設發展的演變和設計，探討城市今昔之別。

壹、希望空間的存有

藝評家廖仁義（1958-）曾說：「當 Starbucks 進入法國羅浮宮時，其民族的識別性就失去了。」生動的描述出現當今全球所正在發生的現況，在街頭中各式各樣招牌、櫥窗，皆顯現著生活的便捷和潮流，這些資本集散的地方形成城市當中特有的在地符號，商店的裝潢和招牌深植了人們的生活型態和經營方式，淘汰改造了原本的傳統面貌，理所當然的融入城市當中，但在這一個看似便利的生活空間，其實我們的生活正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模式下逐漸形塑出來。不管你喜不喜歡，它影響了人們的消費習慣和價值觀，這些與我們生活最緊密的一切，處處為集團、連鎖企業所壟斷，藉由販售的商品（或勞務等形式），導引著我們消費其中；這些轉換，反映出我們城市中型態的變化。街角的雜貨店，不敵賣場的規模和售價，逐漸隨著時間而凋零消逝。消失的商店，寫著社會變遷的歷史；新興的商店，則預說著生活方式的未來。¹許多的傳統店面正悄悄離去，隨之而來商店型態的變化，正改變著我們所有的生活習慣和歷史。

這樣的面貌顯示著地方流動的過程，它的產生會因著區域建設、需求性的改變而有所轉換，不僅運用原來舊空間的改造，創造出新的空間概念，同時也會加入新的元素在裡頭重新詮釋場域關係。在臺灣，因應著人類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地方經濟的復甦，往往是先由在地居民集中的聚落，並隨即引起周邊的攤販設置，進而引發投資商家的加入，造就出地方生活機能的便利性，但從實質及社會面上來看，這些非正式經濟及傳統交易活絡的地方，往往都是都市弱勢族群主要的居住地點，然而有關這些待更新的地區，其在地方上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卻幾乎未被深刻地探究與思考。

每個人都有所謂的慾望城市，假想著自己居住環境的期待及對生活的渴望，這種烏托邦無所不在，存在於你我的日常當中，它塑造了一種希望，希望能夠彌補原本生活中所缺乏的，這種期盼隨著時間空間的流動，不停的交織運轉。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談論奇特空間位置的第一個思考，即是「烏托邦」概念，他說：「烏托邦，是沒有真實地方的位址，它們以完美的形式呈現社會。或者，社會是被顛倒過來的，根本上是非真實的空間」。²烏托邦在多數人的心中認為是一個想像不存在的空間，但是 Ernst Bloch（1885-1977）卻提出「具體烏托邦」的論點，他認為，烏托邦區分「具體烏托邦」與「抽象的烏托邦」，具體烏托邦是一個預想對一個可能建構實際可能性生活之夢想，在現實中尚未實現的夢想，是可透過追求的，

¹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臺北市：麥田，民85），頁90。

²魏光莒，〈異質地域與空間文化〉，《環境異議：城鄉永續規劃與文化研究研討會論文集》，民94年，頁60。

而抽象的烏托邦則具有邁向一個轉變未來的功能。³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夢想，不能只有盲目的空想，而是有具體的實踐，透過具體的方法、步驟，去實現理想中的社會，讓現實存在於希望之中，在人們追求未來的同時，希望成為一種朝著理想實踐的驅動力。另外，盧克曼和波特（Lukerman & Porter, 1976）指出烏托邦是一個人工製造的孤島，它是一個孤立的、有條理組織的，且主要是封閉空間的系統，這個孤島的內部空間秩序安排嚴格，調節著一個穩定的、不變的社會過程。⁴在烏托邦的世界中，排除了一切可能性破壞社會性的力量，每個人都可以在有秩序的工作生活中獲得快樂，並且獲得自由保障，這樣的內部空間，是一個穩定且不變的社會，是一個空間型態控制著時間的環境。人們對所居住的城市有著各自理想中的格局和秩序，這樣的空間秩序，提供了人們對空間無限可能性的設想，在現實生活當中，空間會因隨著人、事、時、地、物而改變，可能擴大、縮小或是轉移，在這樣的變換下，有人期盼，有人失望，每個人對空間的記憶都保有著其心中的位置，而記憶也隨著時間不斷的流動堆積累加著。

美國人類學家 Arturo Escobar (1952-) 指出，無論「全球」如何打造地方與區域世界，重要的是學會看見以地方為基礎的文化、生態和經濟實踐，是重構地方與區域世界的另類視野和策略。⁵當城市舊紋理被快速剷除，並以全球化經營模式處理時，在地特色便會慢慢消逝，在這重構的過程當中，能夠將地方文化特色保存、進一步透過發現及創新、呈現原有之傳統價值，並教育傳承歷史記憶，是一個城市建設當中一個肩負的重責大任。在城市中，不同的樣貌在過去和未來之間重疊交替，一種是透過不斷地翻修，盡力維護原有的街道模樣和建築型態；第二種則是盡可能擺脫過去，拓寬巷道，將木造平房拆除建造成洋房高樓，開發一個全新的城市；而還有種城市則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他們活在匆匆忙忙，日復一日的日子，忙碌的生活裡，無暇過問城市的興衰，對自己而言，他們早已習慣城市的喧囂吵雜，他們只活在當下。⁶

城市的發展和建設皆參照各先進國家之經驗作法和各部會專家學者意見擬定，從「臺灣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之發展歷程」來看，臺灣在都市計畫中，自日治時期1936年的「臺灣都市計畫令」起，已歷經共7個階段，這些都市計畫的歷程，從鄉鎮到都市，從區域性變成綜合整體建設，透過這些少數專家學者對在地文化的認知想像，重建都市和區域空間，實際上，卻往往忽略了在地居民的需求，及大家所盼望的生活型態，致使衍伸許多因浮濫土地徵收或是都市計畫的悲劇產生。David Harvey：「我們建造了房子，房子創造了我們」⁷我們建造了心目中期望的房子，然而這樣的建築物同時也形塑了我們生活的空間。每個人心中所想的空間，都有其計畫，每個人都有對這城市想表達的意見，這個城市透過人們塑造而來，同樣的，經由不同的時間和歷程循環下，它也不斷被需求和建造，並在這生活過程中重塑了自己。

烏托邦的理想與迫於現實的狀況相互影響者，人們起初為了溫飽而努力，接著有了資源能力，為了獲得更高層次的生活而改變與進步，地方的發展與變遷，沒有一蹴可及的理想都市，有的是逐漸轉變、進步，趨近理想的生活空間，當中伴隨著不可抹滅的文化記憶與痕跡，也紀錄著人們追逐理想的歷程；空間別於地方，是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一種「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⁸地方是一個對個人具有意義的空間，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地景等生活周遭所有空間，都有可能因時間累積、置身浸泡其中，轉換成熟悉的「地方」，這個地

³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8-89.

⁴David Harvey 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民95），頁160。

⁵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民95），頁137。

⁶胡晴舫，《城市的憂鬱》，（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民106）。

⁷同註4，頁159。

⁸同註5，頁19。

方具有情感的依托，具有歸屬感與價值，「空間」沒有定形，是不能直接描述和分析的實體，但空間卻為地方提供了脈絡，而延伸另一地方的闡述，藉由人們的營造與認知成了在地特殊意義所在之場域，它賦予我們勞動、庇護、消遣等一切活動，同時也拉近了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和價值。

貳、特殊文化保存與整宅政策下都市空間的轉換

英國建築師 Neil Leach：「對於生活在其間的人來說，建築是一種由建築物來實現的精神秩序，是人類的一種基本需求，也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觀察城市建築彷彿就像是觀察生活其中的人們。」都市往往是許多人求學、就業的地方，經過世代交替，我們所看到的城市面貌，一些習以為常的城市光景，卻是從生活當中不經意的狀況之下慢慢轉變而來，從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到休閒活動，從城市的空間結構、人口分布、商家聚集到機能劃分，顯現城市形成一個規律的生活。這些不同地方場域的產生，形成了地區界定的方式，有著特殊的地點、在地的認同，以及當地日常生活的互動關係。⁹

地方緊緊繫於人群、意義和事物的全球流動方式，致使某些人意識到地方正遭受加速的侵蝕，在大眾傳播、增強的移動力，以及消費社會下，更急遽加速世界同質化。¹⁰全球化導致了地域上的同質性，住家、連鎖店、百貨，逐漸把地方文化特色、傳統生活及消費型態予以統一模式及樣式。Relph：「『無地方性』，也就是削弱了地方認同，以至地方不僅看起來很像，感覺相似，還提供了同樣枯燥乏味的經驗可能性」。¹¹許多人視資本為帶動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和力量，但隨著資本益趨流動，卻產生大量的複製、滲透及普及化，為了對抗資本主義永在的勢力而言，地方卻成了另類的政治象徵。Harvey（1996）指出，當特定發展階段（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的）塑造出來的地景，變成進一步積累的障礙時，繫於地方的固定性和資本的空間移動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就會併發成為普遍危機；於是，地方的地理結構必須重新塑造，圍繞著新的運輸與通訊系統和物質基礎設施、新的生產與消費中心及風格、新的勞動力聚集，以及修改過的社會基礎建設，在創造新地方之際，老地方就必須貶值、毀壞、重新開發。¹²地方和資本之間永遠處在一個緊張狀態，地方卻是固定的，但資本是流動的，地方的「恆常」必須興建在一個無法瞬間輕易毀滅與移動的建設之上。

一、眷村改建—特殊文化保存與開發

眷村，指的是「軍眷住宅」，主要是在1949年起至1960年代期間，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徙至臺灣之國軍及其眷屬，政府機關為其興建配置的村落，遂以日式宿舍、牛棚、農舍等地搭設簡易的生活空間，並在政府扶植下，逐漸發展成特有的眷村風貌，除了由日治時期遺留房舍所留下的眷村建物外，大多眷村都建設於公有地的簡單房舍，規模從幾十戶到百戶不等，是一個近似隔離的社區結構，眷村中的居民多半同屬於相同軍種單位，且眷屬大都經歷遷徙逃難經驗，在村落的牆面，不時都可以看到藉由文字、顏色作為反共的精神標語和符號，在村落中可說是籍貫、習俗皆相同，自自然然形成一個特有色彩，而眷村第二代的眷屬，大都繼承父志從軍報國，其意識形態皆明顯一致；因此，眷村在居民身分和文化的結合之下，使得住戶之間情感互動密切，有著特有的文化場域。

由於當年眷村的房舍均採克難方式興建完成，經數十年使用，多已老舊，至1990年代之後，國防部在推動眷村改建工作因受限於各項法規，且又面臨政府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國宅新建及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下，即配合政府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革條例」草案，另於1996

⁹王志弘，〈地方意象、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1990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8（民94年）：137。

¹⁰同註5，頁73。

¹¹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90.

¹²同註5，頁95。

年，立法院正式通過配合眷村改建的「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法源，此後即加速推動了眷村改建。

眷村改建，多數在原址興建為現代式的國宅大樓，因新增了戶數空間，居住的民眾，除了原先眷村住戶居民外，同時也引進了一般民眾購買國宅的住戶，國宅的住戶型態已非單純的大陸各省老兵眷屬，現代的水泥大樓抹拭了原眷村居民的精神象徵符號，在政府以市容、以經濟等合理化下積極快速拆除、改建，形成了一系列相同模式的建築形態，國宅買賣成為房市競爭交易熱絡的情況，讓原本的眷村特色和居民間特有的文化情誼，在時間及空間的轉變下逐漸淡去。

2000年政府及國軍眷服處更大興土木，加速推動眷村拆除改建政策。致使文化學者開始呼籲尊重社會多樣性和次文化保存，行政院文建會和各地方政府即開始參考國外保留聚落的範例，針對較有特色和價值的眷村文化，進行「歷史記憶」之保存，包括2001年3月第一座部分被保留下的四四南村，亦是國民政府在臺灣所建立的第一座眷村，在政府推動信義計劃區發展計劃後，居民逐漸移出，其中保留四棟作為信義公民會館暨文化公園，並於同年10月正式啟用；另目前全臺各地計有12處眷村已分列為歷史建築及文化景觀，加強保護並留下眷村特有的歷史記憶。

近年來國宅已轉變成以出售為主謀取利潤為導向，雖然在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中有規定5年內不得轉讓，但5年期滿後將房屋轉手他人，國宅便成為住宅交易市場中炙手可熱的商品，房價的價格是不斷翻漲，反而讓中低收入戶無力購買，而後期的出租式國宅供不應求，仍無解決都市中低收入戶住宅的問題。

二、南機場國宅—整宅政策下的都市問題

行經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上，會發現有一個區域住宅老舊，看似像國宅，卻毫無管理的堆疊了違章建築，環境空間擁擠，與隔街「中正區」政經中樞的特殊地理位置很難扯上關係，這個地方是「南機場國民住宅」，又稱「南機場公寓」，曾經是全臺北市最高級的集合住宅，如今卻面臨再次都更需求，爭議不斷的地方。「南機場公寓」為1962年至1975年之間所興建的一批批的「整建主宅」，其中區分了一、二、三期來整建，行政區域分屬在臺北市中正區與萬華區，緊鄰著中華路跟萬華區相望。早期南機場在日本殖民時期是士兵操練與騎馬廠所在地，後來也作為機場使用，因相對於北方的松山機場，所以又稱為臺北南機場。國民黨軍來臺之後，這裡就變成全臺北市眷村密度最高的地方，後因為公共工程拆遷問題與住宅政策，並在1961年波蜜拉颱風造成南機場地區的重大災害，房屋被摧毀達1,402間，並有8,250人無家可歸，1962年在前駐美安全分署署長郝樂氏的支持下，撥款成立「臺北市南機場附近地區新住宅區籌建指導會報計畫組」，由「臺北市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負責推動整建，改善貧民住宅的條件。¹³

南機場國宅在1964年完工，一期忠勤整合住宅之時備受矚目，五層樓的建築為當時住宅中最高，且擁有最大規模的1264住戶，而一樓為開放式平面，主要在滿足住戶經商之需求。在住宅形態上區分甲、乙、丙三種住宅類型，依序坪數為12.91坪、10.2坪和8.65坪，丙種住宅是三者中最小者，但當時仍需要容納一家約5口所需。¹⁴此外，南機場國宅設有獨立水庫、汙水處理場和地下電纜，更有專屬於自己的學校—忠義國小、菜市場與地下社區避難室，為了維持南機場公寓住宅區良好的生活環境品質問題，在建築設計以歐美最新建築工法，大量地採開窗以獲取空氣流通之問題外，特殊的「飛天旋轉梯」設計（如圖1），為鄰里與小孩的社交遊戲最佳場所，具有逃生、通風、進出容易與採光佳等優點，過去亦可當作垃圾投放口，

¹³胡皓璋，〈都市居住的社會排除與包容：以臺北市南機場整建住宅社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民102年），頁33。

¹⁴劉玉嬌，〈夜市文化對社區空間發展之影響：以臺北市南機場夜市為例〉，（華梵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民103年），頁14。

便於清潔人員清潔，全區配置也以南北座向來抵抗夏日西曬的問題，每住戶均有自用廚房和衛浴設備，在當時堪稱為臺北市最高級與現代化的集合住宅，也是每年華僑歸國必參觀的場景。

然而，這個被視為華僑參訪的樣品屋，10年之後竟轉變成首應解決的都市問題，被居民、公部門，乃至大眾媒體認為是臺北市的「貧民窟」、「都市之瘤」。大多數的整宅之所以會被視為是貧民窟，主要的原因是整宅不僅在實質環境、公共衛生、居住安全都低於一般的水準，有些整宅社區的犯罪率也較其他地區為高，此外，更有高比率低收入戶的聚集。¹⁵整宅社區貧民窟特性與意象的形成，是為了容納更多的戶數，並減低成本，以讓拆遷戶可以負擔，因此，多以小坪數、無公共設施、高密度的空間方式來設計，但也由此肇致了整宅形成為都市貧民窟的空間基礎（如圖2）。¹⁶



圖 1 旋轉樓梯為棟與棟的連結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 2 空間的侷限迫使增蓋違建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南機場的空間環境惡化，導因於空間使用上的問題，因為空間不敷使用，每戶人家幾乎都是想辦法盡可能的佔用公共空間，藉由向上、向外的搭建，樓梯間、走廊的擺放等，以增加室內使用空間，這樣的違建模式在人口密集度極高的都會區是相當普遍的，相對的卻也提升了生活中的危險因素。當居住空間的單位面積低於臺北市普遍平均的居住水準時，又因其人口過多、空間的違建，造成居住品質的持續惡化，且實質環境上的惡劣，更進一步讓整宅邊緣化、集中化在這社會當中；¹⁷加上受限於15年不得買賣的契約，且售屋不售地的規定，為非正式的住宅商品，使得日後頻繁的轉售過程中產權不清。南機場種種生活空間上問題的累加，讓當年風光一時的地方，如今演變成社會環境邊緣化的問題。

都市的快速發展，導致城市土地上漲，房價跟著水漲船高，住宅的環境影響著市容、周邊房價也帶動著區域的發展，南機場的整合型住宅，是當年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如今卻又變成區域間發展不均的問題並深化了貧富之間的差距，然而南機場的複雜度其實還高於現存在的貧民窟住宅的問題，如在1975年「萬大計畫」的建設中，讓南機場一帶成為板橋、中和往返臺北市的重要門戶，另1976年南機場夜市的正式行程，讓夜晚的南機場更變得生氣勃勃，透過夜市與社區之間的相輔相生活絡經濟的結果，讓社區不至於完全的凋零，但卻模糊化了南機場社區貧民窟的問題。

南機場是一個典型國家整宅政策的介入，從防洪計畫與整宅政策開始，國家將所有問題的住民加以整合聚集在社區當中，看似解決了所有民生問題，安置了許多違建的拆遷戶，但卻也因為整宅政策導致延續了底下階層邊緣化的種種問題產生。周素卿（2000）研究指出，高層國宅的依序興建，使得整個南機場地區轉化成為臺北市最大規模的國宅社區，在這個地

¹⁵周素卿，〈臺北市南機場社區貧民窟特性的形構〉，《地理學報》，28，（民89年）：50。

¹⁶同上，頁54。

¹⁷同註15，頁59-65。

區性的住宅次市場中，南機場地區的幾個整建住宅社區，在住宅商品的特性與居住環境的特性上，明顯地居於市場末端，更明顯地形塑了南機場一期整宅發展成為低價與半正式的住宅次市場，透過住宅市場的作用機制，更加強化了社區衰頹趨勢，而讓已經部分內蘊的貧民窟體質，更無改善的可能。這是都市整宅政策問題的一個實例，但它卻也見證了都市空間的需求轉換。

參、商家聚落與時代記憶轉變下都市空間的轉換

城市中，不難看到許多公共建設假環境改造之名，行資本利潤之實，把科技、商業、藝術融合在一個環結空間當中，強調其功能、機能的方便性，看似華麗新穎的樣貌下，卻失去了其文化上及空間中獨有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在臺北，透過建築構成中的形式外貌，整個都市結構中的階層劃分一目了然，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機能，他們突破原本的建築框架，在狹小方寸空間中不斷地向外擴張，在五顏六色的磚瓦和鐵皮下，大家構築著自我對生活，對空間的想像與追求。以下就臺北圓環與紀州庵文學森林今昔之間空間轉換，作為商家聚落與時代轉變之省思。

一、臺北圓環—商家聚落興衰與都市需求

臺北圓環，又稱為「建成圓環」，早期在臺北人心中是一個攤販組成的「味覺地標」，圓環的興起，可追溯自日據時代1908年日本人提出的「市區改正」計畫，在重慶北路、南京西路、寧夏路與天水路等四條路交會點的圓形空地的中間栽種了榕樹，周圍則種植了七里香，此地自然而然形成當地民眾納涼聊天休憩的「圓公園」；隨著地區的發展、人口的聚集，攤販也逐漸因而聚集，「圓環夜市」於焉而生，日治時期更成為臺北市代表的夜市之一，雖因朝逢1943年臺北大空襲，一度變成防空蓄水池，但在1945年日治時期結束之後，恢復了小吃容貌，風味聲名遠傳（如圖3）。但隨著臺北都市發展逐漸東移，1980年代之後，曾被視為重要地標之一的圓環逐漸沒落，已非官方心中的模範地標，尤其在歷經1993年及1999年的圓環兩度大火後，圓環更形同違章攤販的聚集地，被視為城市破敗荒廢的地方；2002年，馬英九在市長任內雖找來建築師李祖原事務所設計，耗資兩億元新建「建成圓環美食館」，2003年10月重新開幕，但圓環內原本的一些知名老店家如萬福號、三元號、龍鳳號等皆在外自立門戶，讓美食館吸引力降低；此外，新的圓環建築設計，在沒有考慮到經營小吃的需求，不僅空間動線變得狹窄，外圍玻璃帷幕的設計（如圖4），更使得圓環內部產生聚熱效果，導致降低用餐意願，因而產生收益不敷支出的情況，開幕不到三年，攤販從25攤收到只剩6攤，最後在2006年7月正式熄燈。¹⁸



圖3 1963年間建成圓環一景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市場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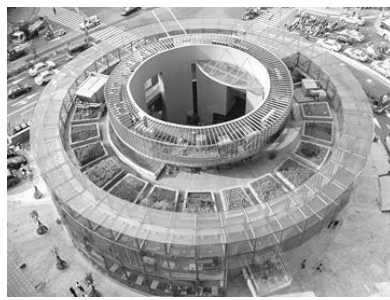


圖4 2003年建成圓環美食館完工照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市場處提供）

2009年，建成圓環更名為「臺北圓環」重新開幕，業者捨棄小吃模式，改以流水席辦桌方式經營，但生意仍不見起色，為了吸引人潮，甚至還引進「人妖秀」，2011年，因華旭公司

¹⁸張哲生，《解讀臺北的生命故事：不如拆掉建公園！回顧臺北建成圓環歷史》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aipei-story/2145>，民107年6月8日。

和經營的流水席公司發生租金爭議，圓環再度熄燈歇業。2012年4月，圓環再由素有「媒體教母」之稱的聯廣集團董事長余湘，與知名節目主持人于美人接手掌舵，又以「臺北圓環保庇館」新開幕，經營國宴中式餐廳，並加入大稻埕的信仰文化元素，但宴客餐廳、文創商店等消費客群與原本夜市客群有所落差，仍無法吸引周邊人潮。¹⁹2014年12月中，圓環內因為開設夜店引發討論，2015年4月15日，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2016年7月委外合約到期後不再續約，並於同年11月24日進行拆除，僅保留1943年啟用的防空蓄水池，並於隔年的7月20日，圓環廣場落成有了新的風貌，在這嶄新的圓環設計中，不再以經營美食為導向，而是改建為綠地廣場，重現「大稻埕圓環防空蓄水池」古蹟，同時搭配廣場地景歷史意象及 AR 擴增實境 APP，把過去圓環的歷史回憶紀錄在這塊原有的土地上（如圖5、6）。



圖 5 臺北建成圓環現況
（資料來源：臺北市府工務局）



圖 6 大稻埕圓環防空蓄水池古蹟
（資料來源：臺北市府工務局）

圓環的轉變，訴說著在地居民跟空間的互動關係，一種記憶中美好回憶的保留，透過翻修，盡可能地能與食的需求結合，能再度恢復以往黃金時期的熱鬧夜市，但對建商而言，圓環不應只是美食館，而是一個新時代的地標，因而採以玻璃帷幕作為主體設計，卻導致了日後衍伸西曬、通風不良問題，而政府官員卻不斷強調攤販經營轉型的概念，最後將問題導向攤販自負盈虧。陳恒鈞、梁瑋倩（2009）在《建成圓環再生計畫失敗因素之探討：參與治理觀點》研究中指出，圓環失敗的主因為政府與建商團隊疏忽了民眾的需求，公民參與政策因欠缺專業知識使得意見淪為民粹。臺北圓環這典型的例子，因政策關係改變了空間型態，想保存記憶又想融合現代都市化的設計，讓臺北圓環失去原有的特色和民眾的需求性，空間亦隨著環境和人們的需求性而有所變化，這個地方指標曾是老臺北人生活中的美好回憶，雖幾經發展與變革仍不能達到每個人心目中的理想，但這個未曾固定的空間卻代表著都市發展新舊之間的交替興革。

二、紀州庵文學森林—都市中的時代記憶與傳承

文學家封德屏（1953-）：「臺北什麼都有卻什麼都沒有，是很多人的卻不是任何人的。」臺北城，這座城市，隨著時光的流轉不斷地變化演進，它永遠無法完全定型，卻延伸了很多闡述和意義，每個人雖然居住在不同的空間，但卻同樣將情感寄託在建築和地域上，對地方依託著強烈的情感，心中存著烏托邦的憧憬，相互循環對應著不容否認的歸屬關係，透過時空間的交互之下，時間在它的身上留下痕跡，空間紀錄了時間，皆代表著一種可能的生活經驗，這些經驗標示了時間，也標示了空間，構成了記憶中的曾經。

每個人都在創造自己的烏托邦理想世界，透過人在空間中的改變和運用，以多用途的方式發揮最大及最便利之效用，空間沒有「專屬性」，是一個被實踐的地點，諸如臺北的紀州庵，一處紀錄隨著大時代流轉不停變動的處所，追溯至日人占領臺灣而起，由當初的料理屋，衍生成綜合河岸生活的休閒中心，從本館、離館到別館，代表著舊臺北水都的景象記憶，日人

¹⁹同註 18。

的建築、生活習性與工作態度，影響著這個時代紀州庵周遭人們的生活，1917年的料理屋開業，1927年的改建與擴大規模（如圖7），1940年因戰亂停止營業，轉變成暫時安置傷患處所，1945年日軍戰敗後，則成為日人臨時居所，直至國民政府接收後，改隸為現今的古亭區，並成為省府員工官舍及宿舍。「紀州庵」原為極具規模的日式料理亭，空間的轉變因環境所需而有重新分配，但唯一不變的是生活空間仍保留著日式建築的獨特風味。在歷經1994及1998年的兩次大火，分別燒毀了本館和別館，最後僅留存了「離屋」，²⁰從興盛轉變至殘破，最後幾乎要改建成停車場用地，所幸在2002年由臺灣大學建築城鄉所學生的發掘和推動，並受到社區民眾的支持，紀州庵得以有了初步保存計畫，經考察周邊環境，更發覺紀州庵為小說家王文興年輕時的居所，因此，紀州庵的重建，不僅以保護老樹為目的外，更透過「文學故事」連結附近「爾雅」與「洪範」臺灣2家著名文學出版社，在新的規劃下，創立「紀州庵文學森林」藝文空間，賦予新的定義，同時也延續原紀州庵風華故事（如圖8）。



圖 7 1917 年平松家族興建之紀州庵支店本館
（照片來源：紀州庵網站）



圖 8 現僅存離屋修建之樣貌
（照片來源：紀州庵網站）

紀州庵周遭聚集許多文人雅士，原因可能是此處承襲日治時代的料理屋，綜合著藝妓、名人雅士休閒創作的一處自然環境、一處聚落，臺灣光復後由國民政府接收，紀州庵轉換成公務人員宿舍孕育的下一代，在當時的環境與教育下，相對於其他勞工階層所給予的文化資本的不足，紀州庵在緊鄰師大、臺大及市政中心的居所，承襲了日治時代人們聚集、特色建築、自然河景與休閒環境的融合地，這塊聚落為見證歷史環境變遷與人們流轉更迭的居所，因慘遭祝融之蝕而破壞殆盡，所幸留下來的部分軌跡能夠協助重建，也印證了環境影響人們生活，彼此如何因應需求、利用空間，相互共生。

烏托邦的基本概念，意味著憧憬超乎現實的另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那麼烏托邦就已經表示對現狀某種程度的不滿以及對現狀的批判，因此，烏托邦的憧憬同時又是對社會現實的評論，是表現社會變革意願的一種諷諭。²¹因為理想，所以朝向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邁進，然而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能實際參與政策發聲者，卻又往往是所謂專家學者之流。上述幾個例子，有的因政策的不恰當而未能解決人們居住和使用的需求性，有的則是經由不斷改變，藉以尋求和地方的平衡對應關係，亦保留了原有地方色彩。從臺灣都市更新政策所做的分析，可以瞭解過去都更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交通、美化環境、公共衛生、違建等問題著手，臺北的都市更新的角度仍未脫離改造環境窳陋的意識形態，且一直未有整體性與長期性的政策指導，只為了周邊房價經濟效益或是選舉政策而實施，但充其量只是以都市少部分迫切的問題視之。這些認定為有待更新的地區與社區，從實質環境面來看雖為窳陋之地，但從社會與經濟層面來看卻不必然全然都是衰敗之處，大部份地區反倒是人口密集、經濟與社會活動也相當活絡。

²⁰黃紹音，《文化空間形成及相關文化活動探討—以紀州庵臺北文學森林為例》，（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研究所，民國106年），頁58-59。

²¹張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民94），頁216。

每個都市都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特性，這些物質的載體有著自己特殊的符號和語言，在每個街角，都有其代表一個地方的特殊樣貌；地方是流動的過程，地方的產生會因著區域、建設而有所改變，不僅會將原來舊的空間的改造創造一個新的空間概念，同時也會加入新的元素在其裡頭，重新詮釋場域關係。在臺灣，地方經濟的復甦，往往是先從地方的一些聚落生活與文化街頭特色食物，而吸引人群的聚集，並隨即帶動起周邊的商家和百貨，創造生活機能的便利；但在實質面、社會面上來看，這些非正式經濟及傳統交易活絡的地方，往往都是都市弱勢族群主要的居住地點，而有關這些待更新的地區，對於地方上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功能，從中所扮演的角色卻幾乎未被深刻地探究與思考。

南機場夜市和臺北圓環夜市皆與當地生活息息相關發展而來，但透過拆除、重建，或是轉移，能否再現原有人與地方上的交流，這或許不是政府考量上的關鍵重點。永和「樂華夜市」因附近居民不滿夜市衍生的噪音、油煙、交通堵塞的問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最高法院採以「經常性攤販集體設攤方式」的《新北市攤販管理辦法》取代非申請案適用的、規範零散攤販的《臺灣省攤販管理規則》判居民勝訴，取消攤販營業執照，而樂華夜市並非第一個被居民抗議、要求搬遷的夜市，在此之前，「師大夜市」已有前例可循，這些政策使得商家不得不另起爐灶，以新樣貌再經營，在這都市間高度的競爭壓力，政府的發展目標亦以經濟成長為優先，其管理方式也會越走向私有化、並朝與公司合夥的方式進行，如何在生活品質、環境空間和在地文化上找到一個平衡點，或許是當今全球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著眼的地方。

Arturo Escobar 認為，地方之間當然彼此關連並相互建構，然而，那些建構導致了邊界、場地、選擇性連結、互動和定位，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了創造歷史的技術更新。²²全球化的盛行看似是消彌其差異，但其仍依附著原地域、文化的情感，並重申界定地方的重要性。Arturo Escobar 又提到，無論「全球」如何打造地方與區域世界，重要的是學會看見以地方為基礎的文化、生態和經濟實踐，是重構地方與區域世界的另類視野和策略。全球化的趨勢影響著地方的轉變，舊的汰去被鑄造成新的面貌，但它的本質依然在場域中流傳延續；當都市舊紋理快速剷除，以全球化經營模式處理時，或者只是將舊有外表加以翻新，而同樣的實質問題仍會孕生而起，窮人依舊流離失所，不斷被開拓、被邊緣化，在這個空間底下不斷地更換面紗，不斷地複製再造。

肆、結論

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提到，因為城市和城市環境代表了人類最協調的、且在總體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及根據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但如果城市是人們所創造的世界，那麼這就是他今後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人類在間接地、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工作性質的情況下，就已在構造世界的過程中重塑了自己。²³最能履行實踐的就是運用在個人生活的空間之中，將生活介入於自己的環境中，來改變自己日常生活的行為，規劃並假想著自己與環境的連結，探索知覺、視覺、感覺與生活的意義。

每個人在心目中都有自己理想生活的空間，這個空間卻是需要透過人與人之間相互構成，經由時間累積，創造一個理想的空間。烏托邦的憧憬不僅在空間上普遍存在，而且在時間上也持續不斷，因為美好社會的前景總是在前頭。²⁴臺北城，這座城市，隨著時光的流轉不斷地變化演進，它永遠無法完全定型，卻延伸了很多闡述和意義，每個人雖然居住在不同的空間，卻同樣寄託著各種情感在其建築和地域上，這強烈的地方情感，心中存有著烏托邦的理想，透過時間空間的交替的下，我們看見自己與地方的生長特性和存有的特殊感情，這個情

²²同註 5，頁 135-136。

²³同註 4，頁 159。

²⁴同註 21，頁 217。

感並非能是全球化資本下所能建構出來的，而是真真實實的從地方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下，所凝聚出不可抹滅的時空情境。都市的空間，隨著時光的流轉而不斷地變幻演進，為這個地方延伸了更多的闡述與意義，這個熟悉的地方，寄託了我們的各種情感，無論是認識、認同、甚至是疏離，這些強烈的地方情感，與文化保留與創新形成循環不息的對應關係，並具有不容否認的歸屬感，與無法推翻的鄉土價值。

The Surve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of Urban Space

Chen-Chieh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Art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Places are interpreted as different meanings of spaces because of its link with people's lives; this kind of practice process changes with time and surrounding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form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to exist with people.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ity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order to proceed with the past, holding on to the present is just like finding sustenance in the past. Based on such the structure of strong local emotions, the modern space is still filled with the hallucination of the past, but actually in essenc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atmosphere have long lost their original appeara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changes with time, but people's wonderful memory toward the environment still remains in everyone's heart. Although the scen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ren't the same anymore, the memory toward the environment never disappears. Through the pursuit of the environment itself, this kind of culture nostalgia contains our different kinds of emotions. No matter what these emotions really are, identification or alienation, these strong local emotions not only have cyclical and lasting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e, having undeniable sense of belonging with each other, these emotions also possess overwhelming local valu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four parts -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eteran village, the South Airport Public Housing, Taipei Circle and Kishu An Forest of Literature, was mainl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special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the whole housing policy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settlement and the urban space under the change of different eras.

Keywords : City, Local, Space, Utopia

參考書目：

- 王志弘，〈地方意象、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1990 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頁 58、135-188，2005。
- 周素卿，〈臺北市南機場社區貧民窟特性的形構〉，《地理學報》，頁 28、47-78，2000。
- 胡大平（譯），David Harvey 著，《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胡晴舫，《城市的憂鬱》，（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2017）。
- 胡皓璋，〈都市居住的社會排除與包容：以臺北市南機場整建住宅社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徐苔玲、王志弘（譯），Tim Creswell 著，《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 張哲生，《解讀臺北的生命故事：不如拆掉建公園！回顧臺北建成圓環歷史。關鍵評論》，（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aipei-story/2145>，2014）。
- 張隆溪，《烏托邦：世俗理念與中國傳統。中西文化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陳恒鈞、梁瑋倩，〈建成圓環再生計畫失敗因素之探討：參與治理觀點〉，《文官制度季刊》，頁 1（3）、81-124，2009）。
- 黃紹音，〈文化空間形成及相關文化活動探討—以紀州庵臺北文學森林為例〉，《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碩士論文》，2017。
- 魏光苕，〈異質地域與空間文化〉，《環境異議：城鄉永續規劃與文化研究研討會論文集》，頁 59-68，2005。
- Levitas, R. Ch. 4. Utopian hope: Ernst Bloch and reclaiming the future, *The concept of utopia*.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83-105, 2005.